

伤寒 方证便览

柳少逸 著



伤寒方证便览

柳少逸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方证便览/柳少逸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32 - 1984 - 6

I. ①伤… II. ①柳… III. ①《伤寒论》-方剂学
IV. ①R222.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300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75 字数 20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1984 - 6

*

定价 25.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张序

20世纪80年代初,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有一位活跃在山东中医学术界的青年中医大夫,他就是山东名医柳吉忱之子、栖霞祖传世医牟永昌之高徒柳少逸。吉忱先生60年代为山东中医学会理事,与余学术交往甚密。在余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时,中医学术的发展、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及中医人才的培养,是余一直关注的课题,故而对少逸大夫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才之路亦有所瞩目。受山东中医界的嘱托,1987年少逸大夫与其父吉忱先生创建山东扁鹊国医学校,该校后因所在地及主管局的所属问题,更名为莱阳市扁鹊职业技术学校,且于1995年2月因其突出的教学成绩,被山东省教委批建为非学历高校——山东烟台中医药专修学院。余虽为名誉院长,但真正履行院长、教授职责,尚在余从厅长位置上退下来,在潍城百寿堂悬壶时。

少逸大夫1969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但更属60年代“名师带高徒”中医政策实施下成才的一名中医大夫。其幼承庭训,长有师承,加之奋志芸窗,尽得其父其师医学真传。从而形成柳氏学术思想体系: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辩证观。少逸熟谙医易之理,妙识生克制化之道,其治学严谨,以博学、精思、屡试为其要点,坚持中医学思维、方法和概念,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医学自身的学术主体而发展的观点,同时尽力采用和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丰富和完善中医的理论体系。其医学研究注重“沟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学博则悟,悟通则约,约成则精,故学有所成。

《灵》《素》乃医理之总汇,临证之极则。少逸在弘扬“人类-环境”这一系统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医学内在的规律和

学术特色，结合中国数术学中太极论的道论、三五论的数论和形神论的象论等精微理论，由对《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拓展，进而提出了“天人合一”《内经》中医流派的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即《内经》中医学。著有《中国象数医学概论》《人癌之战与三十六计》，并主编了《中国象数医学研究荟萃》。其临床，则勤求古训，采撷百家，既有师承家传，又有个人发挥。临证注重阴阳调和，以“阴平阳秘”为要。宗景岳“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意，临证倡导太极思维方法，运用医学系统方法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从而建立起病机四论体系——老年、退行性疾病的虚损论，功能失调性疾病的枢机论，器质性病变的气化论，有形痼疾的痰瘀论，为解释慢性、顽固性、疑难病证和各科杂病的病因病机纲领。

夫涉山必历层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内》《难》《伤寒》《金匱》《脉经》《本草经》，必读后人之说。此即“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之谓也。少逸崇尚经方，博极时方，读仲景之书而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枕耽《伤寒杂病论》几十载，潜心钻研，广验于临床，裒然撰述《少阳之宗》，于1993年付梓，阐述临证辄取少阳转枢之机，述小柴胡汤及其变方百余首，熔经方时方于一炉，集小柴胡研究之所成。

去年季秋，少逸来潍城，邀余为其书稿《伤寒方证便览》作序。并告云：其父吉忱先生教子课徒之始，即以“仲景宗《内经》，祖神农，法伊尹，广汤液为大法。晋宋以来，号名医者，皆出于此。仲景垂妙于定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深究博览之”为训。《伤寒论》397条，113方，每日必背诵一遍。就一部《伤寒论》而言，是在背诵如流之后，方授课说难，递次讲授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柯琴《伤寒

来苏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及恽铁樵《伤寒论辑义按》，让其在六经辨证说理间，潜移默化地感悟仲景辨证大法，其父称之为“神读”。及至从师于牟永昌先生，程门立雪，凡六易寒暑，为先生唯一传人。牟永昌先生以家传秘本《伤寒第一书》“治分九州”之全书授之。研读间，有先生之父儒医希光公之批注钩玄，为先生家传之秘。时维1983年，少逸深忧“执古方不能治今病，读医经不如多临证”之说日繁，又鉴于“世以医为难，医家尤以治伤寒为难”之境况，为读古人之书而晓其理，辨古人之方而明其用，集二十年研究之心得，发皇古义，融汇新知，而有《伤寒方证便览》结集。然其谨记清·陈梦雷“医为司命之寄，不可权饰妄造，所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九折臂者，乃成良医，盖谓学功精深故也”之语，而未付梓。三世者，三世之书也，《内经》《本草经》《脉经》也。

时过境迁，又是三十载，其间合以家学师承及个人临床之验，五易其稿。余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斯书上承仲景之旨，下贯后世之论，融古今医家临证之精华，而成其集，此乃立意伤寒方新用也。故而余认为此乃为一部中医临床应用和研究伤寒方的可资之书。

清·陈修园在《金匱要略浅注》中云：“学者遵古而不泥古，然后可以读活仲景书。”此即少逸大夫之谓也。清·吴谦等在《医宗金鉴》中尚云：“著书立论，必须躬亲体验，真知灼见，方有济于用。”此《伤寒方证便览》之谓也。明·朱惠明在《痘疹传心录》中有云：“医者要当深研经典，旁搜书论，潜心体认，融会始终，恍然有悟于古人之微妙，则脉理斯精辟，药性斯明悉，乃可以行于世。”此中医成才之谓也。

是为序。

张奇文

2014年于鸢都潍坊百寿堂



自序

—

仲景在其卓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又云：“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从而说明了张仲景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精神，继承和掌握了深奥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卓有成效的方药知识。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讲到战国扁鹊秦越人受业于长桑君，授以禁方。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仓公淳于意拜师同郡公乘阳庆，“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公乘阳庆传仓公的医书计10种：《黄帝扁鹊之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许多内容包括在现代的《黄帝内经》之中，不过仓公时代不用《黄帝内经》这一名称罢了。《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据宋代邵雍、司马光等人考证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据龙伯坚氏考证《素问》的著作年代分三部分。即前期内容是战国时期，后期内容是东汉时期，再后是魏晋时期作品。第一部分当是属扁鹊以后、仓公以前的战国时代的作品，《素问》《灵枢》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治疗方法是针刺疗法，而秦越人的治疗病案亦是以此法当家的。而仓公治疗的26例病案中，有12例使用了

汤液，而且他的老师传的十部书中，也有《药论》一书，说明汤液的广泛应用当是西汉以后的事。《黄帝内经》共引用了古代医书 21 种：《五色》《脉变》《揆度》《奇恒》《九针》《针经》《热论》《刺法》《上经》《下经》《本病》《阴阳》《阴阳十二官相使》《金匱》《脉经》《从容》《形法》《太始天元册》《脉法》《大要》《脉要》。其中没有论及药学的专著。而《素问》七篇大论中的《至真要大论》篇，讲到了药物的上、中、下三品，当是西汉末年《本草经》产生以后的事，又讲到药物的君、臣、佐、使，则比《本草经》更进了一步。所以《素问》七篇大论的内容当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就其文体而论，既不是战国时期的文体，也不是隋以后的文体。

综上所述，药物在西汉仓公时代已被广泛应用，并发展于东汉时期。西汉的鼎盛，东汉的中兴，《内经》的完善，《难经》的传世，《本草经》的问世，以及《伤寒杂病论》的形成，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肯定地讲，东汉张仲景是见到了《史记》中的“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内经》引用的 21 种古医书及公乘阳庆传仓公之 10 种医书的。就是说仲景吸取了先秦及汉代的医药知识，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而形成了辨证论治体系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也正如其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所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清·王士雄在《潜斋医话》中有“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经》，三曰《素女脉诀》，脉诀可以察证，针灸可以去疾，本草可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言医”之论。而医圣张仲景，堪称三世之医也。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著《伤寒杂病论》，其理论基础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明仲景乃一儒者，必精于四书五经，故仲景是一位通晓文史哲而精于医者。清·陈梦雷云：“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

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素》《难》《本草》《脉经》而不少略者，何也？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难》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从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此论概涵了医圣张仲景的知识结构。故清·张畹香云：“学医总须多读书，多看各家书籍，自然腹中渊博，胸有准绳。”

以上所述，说明了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即在《内经》《难经》等古医经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成其书。在那个时期，《灵枢》称为《九卷》，《难经》称《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医籍现已佚失，但其内容仍保留在《素问》之中。那么《胎产药录》是否就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的原本呢？

宋·孙奇、林亿等在校定《伤寒论》序中云：“《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清·张璐《张氏医通》引用书目中记有《伊尹汤液》，在卷十六中有“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上述《伊尹汤液》当为古医籍《汤液经法》。由此可见，伊尹根据《本草经》的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而仲景继承了伊尹《汤液经法》的经验，广验于临床，从而发展了药物学的知识。仲景《伤寒论》方、药知识取法于伊尹《汤液经法》，从而形成了《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中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中的一部分内容，而绝不像有的人认为张仲景《伤寒论》的雏形是《汤液经法》，此论大有失于偏颇。其理、法、方、药则宗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及《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等古医籍是毋庸置疑的。

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经方中有《汤液经法》等古医籍。可以想象仲景是见到上述诸书的。据敦煌医学文献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五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寻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进一步说明了仲景《伤寒杂病论》方药知识的渊源。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至于张仲景方剂命名，不用二旦、四神之名，陶弘景认为：“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如：“建中补脾汤”更名为“小建中汤”；“小阳旦汤”更名为“桂枝汤”；“大阴旦汤”更名为“小柴胡汤”；“小青龙汤”更名为“麻黄汤”；“大青龙汤”更名为“小青龙汤”。非但医圣张仲景，神医华佗辈的方药知识亦源于《汤液经法》，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称“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名擅新异，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于规矩也。”《汤液经法》在汉代是与《内经》并行于世的古医籍，是古代医家医疗经验的积累，它同《内经》冠以黄帝、《本草经》冠以神农一样，而《汤液经法》的作者则成了发明汤剂的商代贤相伊尹了。但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与《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脉经》一起构筑了古代中医理论体系的经典著作，与《汉书·

艺文志·方技略》中的“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中的大部分著作一样，湮灭于东汉及其后的战事之中了。

二

《伤寒论》本名《伤寒杂病论》，何时分为两部？王焘在《外台秘要》中称“仲景之书，一而已矣，判为要略者，盖自王叔和始”。就是通常讲的《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公元3世纪初（200~210年），书成后值汉末时期，战争纷起，以致佚失不全，后经晋太医令王叔和将该书伤寒部分进行了收集，整理编次，至宋代复经林亿等加以校正，方以397条113方而传于今。而明·徐镠则认为“宋时才分伤寒、金匱要略为二书”。总之，无论分于晋还是分于宋，都是汉末仲景以后的事。宋·孙奇、林亿等在《金匱要略方论》序中云：“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核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匱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匱方论》。”从此段序文中可知，林亿等所校医书三部，即《伤寒论》《金匱玉函经》《金匱要略方论》。因已有单行本《伤寒论》，故在校《金匱玉函要略方》时将伤寒部分节略，而成《金匱要略方论》。

从上述序文中可知，另外尚有《伤寒论》的别本，即孙奇等

在《金匱要略方论》序中所言及的“次校定《金匱玉函经》”。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校刻的序文中说：“《金匱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匱录，故以金匱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该书的流行本不多，目前仅能得见清康熙末年何焯以宋钞本授上海陈世杰的雕版本。陈世杰序曰：“《金匱玉函经》八卷，汉张仲景论著，晋王叔和所撰次也。其标题盖后人所加，取珍秘之意。”因书名和《金匱玉函要略方》很近似，所以宋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朝徐镕序《要略》时，都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是否真出于王叔和，其中的问题还多，据任应秋先生考证，《金匱玉函经》和《伤寒论》不同的地方，主要是：①没有仲景自序；②没有伤寒例；③有辨脉，无平脉；④第一卷有证治总例；⑤第七卷有方药炮制；⑥痙湿暍篇列在辨脉的前面；⑦厥利呕哕篇和厥阴篇分列成两篇；⑧可不可等篇，除汗吐下外，增加了可温、不可火、可火、不可灸、可灸、不可刺、可刺、不可水、可水、热病阴阳交并生死证十篇。证治总例的内容，大体与《千金方》治病略例、诊候等篇相类似，不仅篇中有引用张仲景的话，说明不是仲景的作品，而且篇中有“地水风火，和合成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起”等佛经上的话，它的产生年代，可能还在魏晋以后。五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中有“本云《玉函经》作本方”，文中的《玉函经》即《金匱玉函经》，即《伤寒论》别本，非杂病部分的《金匱要略方论》。

三

《金匱要略》的内容，原书共25篇，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属于总论性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都以例言的形式，做了原则性的提示，故在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第二篇至第十七篇属于内科范围的疾病。第十八篇属于外科疾病。第十九篇将不便归类的几种疾病合为一篇。第二十至二十二篇，专论妇产科疾病。最后3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前22篇中，包括40多种疾病，共载方剂205首（其中4首只列方名而未载药味），是传世的经方部分。第二十三篇方剂23首；第二十四篇21首；第二十五篇14首，于是25篇中共计载方262首。此即《金匱要略方论》序中“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之谓也。在治法方面，除使用药物外，还采用了针灸和饮食调养，并重视加强护理。在剂型方面，既有汤、丸、散、酒的内服药剂，又有熏、洗、坐、敷等外治药剂。

《金匱要略方论》是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书名《金匱要略方论》，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之意。由于本书在理论上和临床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于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所以古今医家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赞誉其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如：《注解伤寒论》序称“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之祖”；李东垣、张易水称“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清·尤怡在《金匱要略心典》序中称“《金匱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也”。

《金匱要略》原书早已佚失，到了宋代才经林亿等校对，其中残缺错误之处仍多，较《伤寒论》尤为难读。所以历代注《伤

《伤寒论》者不下百数十家，而注《金匱要略》者仅数十家。其编注方式，有的是根据原文逐条注释的，如清代官定的《医宗金鉴》，尤在泾的《金匱要略心典》等；有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金匱要略》条文或方剂的，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张路玉的《张氏医通》等；有的是集各家注解加以译注的，如日本丹波元简的《金匱玉函要略辑义》等。至今全国统编中医教材《金匱要略讲义》有六版之多。其治《金匱要略》的方法：多根据现有水平加以继承整理，对目前难于理解的问题，可以阙疑，不必强释，以免有失原义，或作“附录”，慎重保留，以供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在切实掌握其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参考历代有关医家的注释和内伤杂病的重要文献，以及有关应用原书理法方药的医案，从中进行探讨，以弥补原书之不足；此外，尚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和发展，从而使该书在临床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统观《金匱要略》原著，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脏腑经络学说，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及临床理法方药都有详略不同的论述，阐明了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和治疗方法，为中医学奠定治疗杂病的基础。直到今天，原著仍然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故而笔者认为，鉴于经方应用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治《金匱要略》同治《伤寒论》一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医圣仲景成才之路，此当为研岐黄之书者奉为主臬。“书宜多读，谓博览群书，可以长见识也，第要有根柢，根柢者何？即《灵枢》《素问》《神农本草》《难经》《金匱》、仲景《伤寒论》是也。”此清·程芝田《医法心传·读书先要根》中之语。柢，树木之根，有根柢即有根底，根深柢固也，医学之根柢即今天所讲的要有四大经典之根基也。当然研医学经典著作不是“厚古薄今”，对此历代先贤尚有真知卓

识。清·刘奎称：“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清·俞震认为：“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譬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譬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故而今天治经方，旨在弘扬古代医学精华，汲取今人之成果，借鉴古今，临证通变，提高临床疗效，是我们当代医家的重要使命。

20世纪70年代初，余请师兄王树春先生以魏碑体书民国医学大家张锡纯语以自励：

广搜群籍撷其精，参以西学择其粹。

柳少逸

2014年5月30日



前 言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著，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汉书无传，唐《名医录》有“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所能及”的记载。《伤寒论》为祖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原著名《伤寒杂病论》，亦称《伤寒卒病论》，考“卒”乃“杂”之误。全书分伤寒和杂病两部分，约成书于公元200~216年间。由于汉末战争纷起，以至原书十六卷散失不全。至公元256~316年，经晋·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进行收集、整理、编次，而成《伤寒论》。至宋代复经林亿等加以校正。全书共十卷，凡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条，一百一十三方，用药八十七味。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由此可见，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以其临床经验，根据《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总结成为六经辨证，严密而有效地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清·张璐称“伤寒诸方，为古今方书之祖”。故而被后世称为“医圣”“经方之

祖”。对此，元·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有“昔在圣人，垂好生之德，著《本草》、作《内经》，仲景遵而行之以立方，号群方之祖。后之学者，以仲景之心为心，庶得制方之旨”的盛誉。

《伤寒论》主论风寒，兼论杂病，是通过伤寒与杂病的具体事实，而阐述它的辨证论治体系，即伤寒与杂病共论的辨证方法，此即柯韵伯所说：“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能脱六经，故立六经而分司之。”历代医家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的认识，总起来从脏腑、经络、气化、部位等方面的解释方法，虽各有发挥，但亦各有其片面性，“扶阳气”“存阴液”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核心，是以祛邪与扶正两大法门来实施的。因此只有从临床实践出发，把六经辨证分类的脏腑、经络、气化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阐发出《伤寒论》“六经”原旨。同时，只有结合临床实践，参以现代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多方位的综合研究，才能继往开来，拓展《伤寒论》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体系和辨证法思想。

《潜夫论》云：“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此约言方者，药方也。《诗·大雅》云：“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毛传注云：“方，则也。”《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颖达疏云：“方，道也。方谓法术性行。”故广而言之，方者，法度、准则也，又义理、道理也。明·李士材《伤寒括要》有“方者，定而不可易者也；法者，活而不可拘者也。非法无以善其方，非方无以疗其症”的论述。清·吴谦《医宗金鉴》尚有“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于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执其方，是执方而昧法也”的记载。故“方因法立，法就方施”，乃仲景组方之内涵。从而印证了方剂学是阐明治法与方剂基本知识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

“方有膏、丹、丸、散、煎、饮、汤、渍之名，各有取义。